

# 農村的行政動員與發展災難

## ——論《丁莊夢》中的「賣血故事」

• 黃 勇

**摘要：**閻連科小說《丁莊夢》倒敘後集體化時代中原農村丁莊「賣血—染病—毀滅」的故事，再現了河南東部「艾滋病村」的死亡危機，並追溯了1990年代初期地方政府主導下的集體賣血亂象。本文還原了小說作者所迴避的農民負擔沉重的重要歷史背景，並依據小說文本和學者的研究重新梳理了當地政府發動農民集體賣血的行政動員策略及過程。丁莊人瘋狂賣血並最終染病的悲劇，並非一般小說中所呈現的虛構性故事，而是現實生活的生動寫照。這一悲劇深刻體現了當代中國鄉土社會在重建過程中遭受的雙重困境：除了不恰當的行政干預外，更是1990年代以降商品經濟與消費主義在鄉村蔓延泛濫，農民片面追逐物質消費，其代價是身體(血液)的商品化並最終毀滅。在對丁莊人賣血與患病的刻畫中，作品表述了當下國家與鄉村的關係隱喻——丁莊即中國，丁莊夢又豈非中國夢？

**關鍵詞：**《丁莊夢》 賣血 艾滋病 消費主義 商品化

閻連科的長篇小說《丁莊夢》<sup>①</sup>講述了後集體化時代河南農村丁莊「賣血—染病—毀滅」的故事，藝術地再現了二十一世紀初年河南東部「艾滋病村」集體病發的危機，並追溯此前十年(也即1990年代初期)地方政府主導下的集體賣血亂象<sup>②</sup>。從賣血的「啟蒙」與組織和身體的商品化過程切入，《丁莊夢》的情節與指向隱喻了後集體化時代背景下鄉村與國家之關係。在很大程度上，丁莊即中國，丁莊夢又豈非中國夢？作家以近乎絕望之悲憫，使小說深浸末日天啟意蘊，足資深思與討論。

\* 本文為暨南大學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項目「轉型期中國鄉村的倫理人情衍變」(10JYB2007)及暨南大學科研培育與創新基金項目「當代文學理論研究的範式危機與轉型」的階段性成果。

《丁莊夢》的故事發生地是位於河南省豫東平原的丁莊，依舊是閻連科得心應手的那片土地、土地上討生活的鄉民，以及他們世代聚居的鄉村世界。賣血之前的平原小村丁莊，與周邊許多村莊並無二致，是後集體化時代較為典型的中國內地鄉村：經濟來源以農業為主，民眾普遍貧窮；人際關係相對封閉，村落自成一體，傳統習俗得到一定的保留，但歷經時代變換與歷史震蕩，宗族或行政力量並不佔據絕對的權威地位。也就是說，1980年代中後期以降中國的鄉村生態，正處於脆弱的蛻變或轉型期：一方面，全能型的「國家」力量撤出殆盡，「集體」也是名存實亡；另一方面，鄉村公共生活與秩序又尚未定型，出現了鄉村權力與社會組織的真空，亟待重建<sup>③</sup>。

小說的表現重點，自然是後集體化時代丁莊的集體賣血事件及其慘重後果，但作家卻似有意無意迴避了「農民負擔」這一重要歷史背景。姑且不論這是否因為藝術表現上的考量，但現實語境確實如此：1990年代中前期，也即丁莊人賣血前夕，正是農民負擔較為沉重的時期。根據經濟學者的研究，中國「自1993年後，各省按TFEE〔大意为「總負擔」〕計的負擔都有所增加。……平均而言，落後省份的稅費負擔較發達省份更重。例如，20世紀90年代後期廣東和浙江的TFEE約為7%-9%，而山西、安徽、河南和甘肅的這一數字為11%-15%，……較落後省份的地方性收費的嚴重性更為突出。……由於收入較低農戶的收入結構主要以農業收入為主，因此這部分農戶更容易受稅負的影響，且更窮農戶承擔更高稅費比重<sup>④</sup>。而正是背負沉重負擔的丁莊人，為行政力量所煽動、誘導與驅使，集體走上了「賣血—染病—死亡」之路。

由此，丁莊的命運發生鉅變：因狂熱的行政動員與組織、物質消費主義等外在作用力下一度空前繁華，又因人們賣血所感染的艾滋病極盛而衰。對於生活在中原大地的農民來說，因賣血而大面積感染艾滋病死亡的變故，不啻於土改翻身或農業集體化帶來的震蕩。簡言之，這是當代中國鄉土社會重建過程中遭遇不恰當行政干預與片面追求物質消費、盲目逐富的惡果<sup>⑤</sup>。如果我們在此套用閻連科在某次訪談中「我的作品都離不開土地，都是土地之花，哪怕是『惡之花』」<sup>⑥</sup>的說法，那麼從《日光流年》，到《堅硬如水》、《受活》，再到《丁莊夢》，閻連科關於中原大地書寫的「惡之花」，可謂愈開愈盛、愈開愈烈<sup>⑦</sup>。

閻連科的筆觸遊走於丁莊與中原大地，出入於現實與夢境之間，我們在此以「疾病」為切入點，來處理世紀之交國家與鄉村互動中的行政動員、賣血與身體商品化等農村發展過程中的複雜關係。

## 一 賣血的「啟蒙」與組織

對於傳統的丁莊人來說，「賣血」無疑是陌生而震撼的大事。與之前數十年間諸多政治運動一樣，「賣血」也是源自上級行政力量的主導與推動。在一個「莊裏屯着很多春天的暖和爽，街上的清香撲鼻子」的仲春日子裏，丁莊迎來大人物：「縣裏的教育局長」。高局長來到丁莊，既不是檢查教育工作，更非觀光旅遊，而是身背重任：「來莊上動員賣血的事。」<sup>⑧</sup>由於「血」在中國傳統文化觀念中

《丁莊夢》的表現重點是後集體化時代丁莊的集體賣血事件及其慘重後果，但作家卻似有意無意迴避了「農民負擔」這一重要歷史背景。而正是背負沉重負擔的丁莊人，為行政力量所煽動、誘導與驅使，集體走上了「賣血—染病—死亡」之路。

由於「血」在中國傳統文化觀念中的特殊性、對於人的身體健康的極端重要性，以及血液具有強烈的「私人性」，因此，在以「賣血」為核心目標的動員與組織以前，必須對農民的思想觀念做有效的「啟蒙」、轉化乃至徹底顛覆。

的特殊性(如「血濃於水」等)、對於人的身體健康的極端重要性(如身體是「血肉之軀」等)，加上在現代西方醫學知識與體系大規模傳入與普及前，在缺乏血型分類與輸血技術的條件下，血液具有強烈的「私人性」，是不可或者無法參與流通或流轉的，因此，在以「賣血」為核心目標的動員與組織以前，必須對農民的思想觀念做有效的「啟蒙」、轉化乃至徹底顛覆。茲事體大，任務艱鉅，一度難住了行政經驗豐富的高局長。但局長又豈非等閒之輩，他因地制宜、鍥而不捨地推動了強大的行政動員。整個動員過程，大致分為四步：

第一步，倚靠丁莊原有的權力班子，主要是老村長李三仁。這本應是最為直接、成本最低的一步。但李三仁堅守「傳統」，反對賣血，先後兩次拒絕高局長的命令。

高局長第一次找李三仁就碰了釘子：「李三仁便驚着張大了嘴，說：『天呀，你讓賣血呀！』」「張大了嘴：『老天爺，讓百姓賣血呀！』」<sup>⑨</sup>村長拒絕開會動員。三天後當局長再來，村長則沉默以對。思想傳統的村長，始終無法理解和認同政府動員民眾賣血的行為，因此罕見地先後兩次拒絕來自上級的命令。但是，處於權力等級末端的他，其抗爭雖是堅定的，卻注定是無力和無奈的。

第二步，撇開抗命的舊班子。事不過三，高局長在第三次到丁莊時，便不客氣地在莊民大會上把當了四十年村長的李三仁撤職了。高局長於是親自上陣，從發展經濟的角度來動員和說服群眾。

遭罷免的老村長李三仁作為老資格的退伍軍人，在村長任上兢兢業業帶領丁莊人幹革命「奮鬥」了四十年。這是一位「梁生寶」或「蕭長春」<sup>⑩</sup>式的基層幹部，在集體化時代(1950至1970年代)作為黨在鄉村的代理人角色而被賦予了「領導」的合法性，並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黨的權威。然而，在集體化解散之後，由於「基層公共權力合法性下降，鄉村幹部在村莊中的道德形象並不為村民所認可」<sup>⑪</sup>。在看重個體經濟收入的後集體化時代，作為丁莊長達四十年帶頭人的李三仁，其威信與地位也隨之土崩瓦解、一落千丈<sup>⑫</sup>。

儘管如此，李三仁畢竟在形式上還是丁莊的「一把手」，僅由於在動員賣血過程中的消極與不作為而遭到罷免的下場。這一罷免模式是自土改以來農村基層權力更迭的慣用模式：上級部門有權直接任免，標準在於能否貫徹、推行黨的政策。正如論者指出：「這種自上而下安排村莊的治理制度，決定了國家必然要在鄉村地區尋找新的代理人，以保證其政策法規的貫徹和執行。」<sup>⑬</sup>拋開原基層代理人李三仁之後，高局長親自出馬游說村民賣血：「說了前，說了後，說了發展血漿經濟，力圖民富國強的話。」<sup>⑭</sup>教育局長如此賣力鼓吹，必有其官場中的壓力與動力。壓力來自於「上級單位」的動員賣血責任制：「全縣的各局、各委都到下邊動員農民賣血呢，教育局分了五十個動員村。」如果在丁莊的第一炮打不響，「以後我這局長咋當呀」<sup>⑮</sup>。這是一項關乎局長政績、仕途的重大行政命令，不由得局長不高度重視、如臨大敵。

第三步，委託德高望重者親身示範，宣傳「賣血無害」的道理。

李三仁下台以後，丁莊一時缺乏合適的繼任者，高局長只好軟硬兼施，說服在小學裏敲鐘的「我爺」丁水陽老人出馬。善良的丁水陽出主意在河灘挖坑舀水，在群眾面前為「賣血無害」做示範宣傳。示範結束後，局長以一副恨鐵不成

鋼的態勢告誡眾人：「你們丁莊解放幾十年，共產黨領導你們幾十年，社會主義幹了幾十年，你們莊還是草房一片連一片」，賣血與否，成了「走金光大道奔小康，還是過獨木橋重當窮光蛋」的分水嶺<sup>⑥</sup>。高局長的話，本質上是集體化時代耳熟能詳、一度激憤人心的宏大話語與思維邏輯的延續，如「解放」、「共產黨領導」、幹「社會主義」，「金光大道」等等。話語雖則宏大、動聽依舊，但今非昔比，如此老調重彈已經無法像集體化時代上通下達般高效。丁莊的農民面對着局長的賣力宣傳，仍然不為所動。舊話語在新時代遭遇滑鐵盧，折射出集體化時代國家宏大話語在後集體化時代的蒼白與無力的命運。具體到局長的前三次動員，它們準確地反映了1980年代中後期以降國家與鄉村的鬆散關係：來自「上面」的話語不再具有高度的權威與感召力，領導不再一呼百應；而相應地，基層村幹部並不一定緊跟政治形勢、唯上級的馬首是瞻；處於最底層的民眾，更是各自有着自家的利益盤算<sup>⑦</sup>。

正因為如此，高局長即便使出了三道板斧，也還是未能完成賣血的「啟蒙」與組織動員。村民在空洞無力的政治話語和行政動員面前，在賣血這件極大違悖傳統觀念的事情上，並沒有踴躍參與。但高局長及其行政同僚自然不是等閒之輩，他們果斷地捨棄軟弱乏力的「話語」力量，而巧妙地運用另外一種方式來實現他們的目的——參觀「樣板村」。

第四步，以蠅頭小利引誘村民參觀「賣血模範村」，憑藉直觀鮮明的榜樣，啟迪村民實現從「要我賣」到「我要賣」的轉變，成功完成賣血的「啟蒙」與組織工作。

高局長再次來到丁莊，要挾丁水陽組織丁莊人到其周邊的賣血大縣——蔡縣去參觀。因為蔡縣賣血開展較早、人數眾多且組織有序的緣故，昔日的赤貧縣已脫胎換骨，成了「全省的致富模範縣」。而丁莊人所參觀的上楊莊，更是賣血村莊中的「樣板」：「家家住的都是洋樓房。」而人人臉上洋溢的笑容與滿足感，免費的肉菜供應，一切都像是早年官方宣傳裏所描繪的共產主義社會。上楊莊人的「幸福生活」如閃電般擊中了丁莊人的神經：幸福生活就這麼跟賣血聯繫起來——「天堂般的日子就是靠賣血賣了出來的。」<sup>⑧</sup>夢想中曾經遙不可及的幸福天堂活生生地展現在丁莊人眼前，彷彿唾手可得，丁莊人不願賣血的執拗不攻自破。借助於「樣板村」的神奇力量，高局長在這場「啟蒙」與動員賣血的拉鋸戰中，終於大獲全勝——丁莊人實現了從「要我賣」到「我要賣」的徹底轉化。

作為一種在過去數十年裏行之有效、屢試不爽的政治動員方式，小說中組織村民參觀「模範村」、「樣板工程」之類的活動，往往是先通過樹立模範單位／個人，隨後組織農民參觀，憑藉「榜樣」的力量來啟發、誘導農民接受政府部門預設的價值觀，激發農民嚮往並步入其設定的軌道。這種「樣板」在全國以及河南省由來已久、多次出現：遠如1950年代大躍進期間的「大寨村」，近如改革開放年代裏的「華西村」，1990年代的「南街村」、「竹林村」，舞陽縣的「富民工程」、「小康示範村」袁莊村等。這些「樣板村」、「樣板工程」多與政治力量掛鉤，有其歷史特殊性，其「成功經驗」難以複製，不具備普遍推廣的條件。但在其「鼎盛」時期，無論是對實地參觀者還是周邊的鄉民來說，都有着非凡的魔力與吸引力。

小說中組織村民參觀「模範村」、「樣板工程」之類的活動，往往是先通過樹立模範單位／個人，隨後組織農民參觀，憑藉「榜樣」的力量來啟發、誘導農民接受政府部門預設的價值觀，激發農民嚮往並步入其設定的軌道。這種「樣板」在全國以及河南省由來已久。

高局長進村做賣血的「啟蒙」與組織工作乃是受了縣政府責任制之驅使。討論這個行政動員問題時，必須將其置於後集體化時代農村經濟發展與社會重建這一背景下。地方政府動用行政資源強力推行「血漿經濟」並造成災難性後果，既是小說情節，更是直擊當下現實。

《丁莊夢》所述的賣血大村上楊莊，在丁莊參觀者眼裏，大抵不啻於人間天堂。於是，「丁莊開始賣血了」，而且「繁華了」、「熱鬧了」，「一轉眼就成了滄縣的模範血源村。」<sup>①</sup>

高局長進入丁莊的一幕給人似曾相識的感覺，與1940至1950年代眾多革命題材小說的開頭有着高度相似的敘述模式：一個原本「自然」、「寧靜」的村莊，突然某一天從外部來了一個（隊）人，帶來了革命的思想火種，帶領村民改變不公的秩序與命運，最後革命宣告成功。周立波的《暴風驟雨》便是這一敘述模式之典範<sup>②</sup>。也就是說，這股外來的力量，在當時的語境下被表述為一股積極、進步、強且大不可逆轉的力量，它的引入為村莊帶來「解放」與轉機，推動其發展，如唐小兵評論該小說時指出：「大馬車的駛入及工作隊的到來隱喻了新『象徵秩序』的強行插入。」<sup>③</sup>在這一模式下，「外來者」總是如同普羅米修斯般崇高與偉岸，其帶入的星星之火最終燎起了鄉村之原。

這套敘述模式下，「外來者」撒下的，基本上都是革命、希望的火種。而在近年來如范穩的《水乳大地》、阿來的《空山》、遲子建的《白雪烏鴉》等相關的文學書寫中<sup>④</sup>，這一敘述模式遭到了顛覆。「外來者」闖入後帶進來的，往往並非福音，而更多是疾病、戰亂、災難、死亡與毀滅，仿如打開了潘多拉魔盒。在《丁莊夢》之前，閻連科已在《堅硬如水》中生動地刻畫了退伍軍人高愛軍給故鄉帶來的以暴力與破壞為主的「革命」。而《丁莊夢》裏高局長所代表的政府所引進的，是身體的商品化，是用賣血來換取貨幣、換取商品、換取消費的組織化行動，並由此帶來輸入性的、帶有高度傳染性的「瘟疫」。

斗轉星移，高局長已非當年《暴風驟雨》裏幾乎無所不能的工作隊長蕭祥。但歷史地比較兩者，卻又呈現出驚人的相似性：外來力量主導下的村莊精英重新洗牌，帶領民眾虛幻地「翻身」，歷史已經證明當初的美好允諾無法實現。其相類並非偶合，豈非對「翻身」與「共同富裕」的一次揶揄？

## 二 身體(血液)的商品化

參觀「樣板村」之後，丁莊人開始狂熱賣血：「丁莊轟的一聲賣瘋了。」賣血盛況讓人嘆為觀止：「一夜間，幾百口人的丁莊，突然冒出了十幾個血站來。」設立血站的機構五花八門，有縣醫院、鄉醫院、鄉政府、公安局、組織部、宣傳部、獸醫站、教育局、商業局、駐軍、紅十字會、配種站等，「豎立一塊牌子，寫上幾個字，來兩個護士，一個血站就建立起來了」<sup>⑤</sup>。而後從閻連科筆下的「我爹」丁輝所私設的「丁家血站」開始，「丁莊就賣血賣瘋了。平原上就賣血賣瘋了。」<sup>⑥</sup>

丁莊及平原上的瘋狂賣血行為，既是地方政府「管制」政策（具體為發展「血漿經濟」）引導所致，亦是1990年代以降市場經濟與消費主義在鄉村蔓延泛濫的結果：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東南沿海經濟建設「迅猛發展」，相形之下，處於中部的後發鄉村顯得「貧窮」、「落後」。後發地區為了擺脫這一窘境，往往由地方政府主導，開展各種「趕超」任務，「血漿經濟」正是如此引入<sup>⑦</sup>。

上文論及縣教育局高局長之所以進村做賣血的「啟蒙」與組織工作，乃是受了縣政府責任制之驅使。我們討論這個行政動員問題時，必須將其置於後集體化時代農村經濟發展與社會重建這一背景下。地方政府動用行政資源強力推行「血漿經濟」並造成災難性後果，既是小說情節，更是直擊當下現實，其波及面之廣，數年來反響頗大。這樣一種不顧實際情況，盲目從政績出發的行政指令與行政動員，多年來一再重演，從未消停。如果我們將其置於晚清以來近代化、現代化的大背景下來審視這種「趕超」心態，可見從集體化時代的大躍進、放衛星、人民公社、大煉鋼鐵，到改革開放、後集體化時代大辦企業、扶持養殖業、種植經濟作物，反覆折騰，都有行政主導的印記。

由於地方官員急功近利，缺乏必要的科學論證與長遠規劃，加上置民生問題於不顧，因此行政型指令指向都殊途同歸——接受指令的農民受損，而推動指令的官員卻從未遭受問責。在閻連科筆下，到丁莊動員賣血並造成多人染病的高局長，事後竟還獲得升遷，諷刺地搖身一變為疾病委員會的負責人。我們必須將這種現象置於目前政治體制下的官員選拔升遷機制下來考察：改革開放以來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使得對地方官員的考核主要是通過層層下達的各種社會經濟發展指標來完成，這就造成「地方政府官員為了達到保有職位和升遷的目的，必須要完成、甚至超額完成這些指標以顯示政績，從而產生不顧當地條件，強行上馬各種工業、或建設一些以基礎設施為主體的『面子』工程，甚至誇大農民人均收入水平，導致浮誇風和弄虛作假。這些行動也往往積累大量債務，增加農民負擔，並最終破壞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sup>②6</sup>。《丁莊夢》所寫的集體賣血及其導致的艾滋病大爆發，顯然就是非理性政府行為的結果。應該說，作為作家的閻連科，對這一政治動員的弊端並無大力批評，相反表現得頗為克制、隱忍<sup>②7</sup>，但小說結尾所呈現的一個個凋蔽的村落，還是間接讓我們窺見其大面積的悲劇後果。

在丁莊的故事中，國家對鄉村的影響，並不因為集體化時代終結、國家權力撤出鄉村而不復存在。根據人類學家閻雲翔的考察，「自80年代初以來，國家對私人生活的控制逐步減弱，同時將主要的注意力放在了經濟和政治的關鍵部門。結果，市場經濟的價值觀、商品生產的方式，以及全球性的消費文化等，即成為推動社會變化特別是家庭變遷的主導力量。」<sup>②8</sup>國家力量撤出的社會空間，一部分由傳統價值觀去收復與填充，而新興的市場經濟、商品經濟和消費主義，無疑顯得更為強勢。由於社會主義道德與傳統倫理道德的衰微，「非集體化之後的農村出現了道德與意識形態的真空。與此同時，農民又被捲入了商品經濟與市場中，他們便在這種情況下迅速地接受了以全球消費主義為特徵的晚期資本主義道德觀。這種道德觀強調個人享受的權利，將個人欲望合理化。」<sup>②9</sup>在「集體」消褪，「個人」至上的時期，「村民在縱向社會結構中重新拉開差距之後，傳統『倫常』秩序已無法再建構起來。由此，在村莊道德秩序中造就了一種『富即光榮』的話語。」<sup>③0</sup>

然而在意識形態消褪、傳統道德淪落的年代，追逐財富何為？除卻作家所迴避的「農民負擔」問題之外，只能指向物質消費與物欲追求，消費文化由此興起。誠如曹錦清所言：「改革開放後，鄉村文化明顯受到城市文化的影響，而城

在丁莊故事中，國家對鄉村的影響，並不因為集體化時代終結、國家權力撤出鄉村而不復存在。國家力量撤出的社會空間，一部分由傳統價值觀去收復與填充，而新興的市場經濟、商品經濟和消費主義，無疑顯得更為強勢。

市文化，則明顯受到港台文化的影響，而港台文化其實便是歐美消費文化的翻版。」<sup>⑩</sup>消費文化無孔不入、所向披靡，大量的消費需求被製造出來，誘導甚至逼迫農民換取貨幣來消費。企業通過各種廣告來刺激、引導人們的消費欲望，改變着人們固有的人生觀和價值觀。但是如賀雪峰所言，「農民沒有辦法獲得那些正確的人生價值觀，因為他們無法獲得實現這些人生價值所需要的經濟收入。」<sup>⑪</sup>「他們就感覺到自己處於社會的邊緣地位，心裏產生了不平衡感和被剝奪感。」<sup>⑫</sup>在這種愈演愈烈的不平衡感和被剝奪感面前，小說中高局長所持的集體化時代社會主義宏大話語是蒼白無力的。致富與消費對於丁莊這種一無自然資源、二無地理優勢的內陸鄉村來講，似乎過於遙不可及。

只有當丁莊人親眼見到了上楊莊人住的洋樓，享受着傳說中「共產主義」的分配制度，過着「天堂般的日子」，而僅僅付出了胳膊「雨天有些癢，和螞蟻夾了樣」的代價時<sup>⑬</sup>，早已被調動起消費欲望的丁莊人，突然發現只要走上高局長和政府宣傳的「賣血」這條「金光大道」，「幸福」生活就如此近在咫尺。他們壓抑已久的物質欲望如山洪暴發，一發難以收拾。他們嚮往先富起來的「血頭」所蓋的洋樓散發的硫磺味：「很多人家都想生活在這硫磺的味道裏，所以都賣血。」<sup>⑭</sup>因而在接下來的賣血狂潮裏，丁莊人為了發家致富，不惜鋌而走險。在這層意義上，王德威指出<sup>⑮</sup>：

閻連科看出了艾滋的現代性意義，並賦予相當批判。然而他對社會主義市場化以後的經濟發展保持曖昧的看法。以往小農式或合作式的經濟模式不再能夠約束閻連科丁莊的農民。他們現在要的不是子孫香火（《把耨天歌》）、不是宗族倫理（《日光流年》），而是實實在在的物質生活的日新月異。他們把賣血當做沒本的生意，卻落得血本無歸。他們是一群失敗的投資人。

在「賣血—致富—消費」這一因果鏈中，丁莊人把唯一可資動用的資源——「身體」，當成了一本萬利、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商品。誠如黃金麟所說：「1980年代初期後，……資本主義消費文化的高漲和文化工業的極度發展，導致身體成為一個消費商品的戰場，身體在社會學領域中的重要性與能見度因而獲得大幅提升。」<sup>⑯</sup>在這場賣血盛宴上，熱衷經濟發展指標的地方政府及其下屬各機構、血站、醫院、「血頭」以及賣血者等多種力量大快朵頤。由此身體與商品、市場緊密相關。也就是說，在利益和經濟效益面前，丁莊人的身體被物象化、具體化，成了有利可圖的商品。在此意義上，王德威指出，「艾滋村的危機牽涉廣泛，這一危機暴露不只是醫療衛生問題，也是國民經濟問題，以及一個國家對人民身體的監控管理的問題。」<sup>⑰</sup>在各路虎視眈眈的人眼中，身體是一個個能夠生產「血」的流水線車間，是一具具源源不斷地提供「血漿」的機器。

在這條流水線上，「身體」的作用被重新定位，其意義被重新闡釋：身體的「有用」與否，衡量標準不再是強不強壯、健不健康，而是能不能抽血、能抽多少血。身體的感受不見了，「血」或「身體」的傳統意蘊消失殆盡，傳統倫理道德範疇裏的「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等因素被拋到九霄雲外——身體遭到徹底的物

在「賣血—致富—消費」這一因果鏈中，丁莊人把唯一可資動用的資源——「身體」，當成了一本萬利、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商品。在這場賣血盛宴上，身體是一個個能夠生產「血」的流水線車間，是一具具源源不斷地提供「血漿」的機器。

象化。丁莊裏僅有的關公廟也被扒掉了，不信關公，改信賣血。如劉偉所說：「在一個混亂不堪的趕超型現代化中，生存的焦慮讓每一個人都失去了對自身最基本價值的守護耐心，而選擇用一種統一的外部標準去決定自己的行為。因此，每個人都可能迷失而成為受害者。」<sup>③</sup>在赤裸裸的物質化眼光觀照下，丁莊人（包括平原上所有賣血的人）各種鮮活的生命特徵，各種具體的面目、身份差異都被抹平、擦掉，被簡化為千人一面、千篇一律的軀幹，而其結果就是「血液成為流動的資本，就算是骨肉至親也不能擋人財路」<sup>④</sup>。

從丁莊人對賣血的態度來看，先是被動「啟蒙」，而後主動迎合。艾滋病的成因既是外部力量強行帶入的，但同樣少不了丁莊人對賣血的內部認同，「準確地說，是政府動員農民賣血以推動『經濟增長』而農民又『積極配合』的結果。」<sup>⑤</sup>在這個層面上，國家與鄉村形成了怪異的合流。改革開放以來國家片面追求經濟發展、鼓勵民眾追逐物質財富進而造成消費主義泛濫的惡果，在此表露無遺。

政府極力推行的賣血及後來大流行的艾滋病，儘管並非動員之初所能預料，但政府又確確實實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在艾滋病爆發、大面積死人之時，政府本應有所作為，但在小說中，又鮮見政府採取主動的救助或相關措施，任憑丁莊乃至平原陷入混沌、無序與混亂的境地。現實也是如此。正如王德威所說，閻連科本可藉此追索「（因賣血採血所引發的）艾滋病下，複雜的政教腐化、經濟投機、社會福利失控等問題。但這樣寫一定冒犯政治不韙，豈可輕易碰觸？」<sup>⑥</sup>於是作家在迴避「農民負擔」問題之後，再次懸崖勒馬，繞開了對權力尖銳的直接抨擊，將農民為減輕負擔、改善生活而把身體當做商品、賣血圖利的行為及其導致的災難，主要歸因到自私與貪欲這些「人心中的艾滋病」<sup>⑦</sup>。

閻連科繞開了對權力尖銳的直接抨擊，將農民為減輕負擔、改善生活而把身體當做商品、賣血圖利的行為及其導致的災難，主要歸因到自私與貪欲這些「人心中的艾滋病」。類似的「疾病」，是否也正發生在「中國」身上，會不會也導致中國的「死亡」？

### 三 結語

《丁莊夢》中，閻連科儘管虛寫或避開了某些敏感事實，然其現實批判意蘊依舊濃烈。作品通過對中原農村致命流行病的刻畫，實則見微知著地表述着當下國家與地方、鄉村的關係隱喻。正如夏榆的評論所說<sup>⑧</sup>：

生活中有太多變異、可怕的事情。比如「黑磚窯」事件，我們今天，所有的寫作者，還會把它當成個案去看。這是河北的事，這是山西的事，這是河南的事。但是它實際上是中國現實生活中的一部分，它是我們今天中國現實生活的必然代價。

小說中的不治之症，既發生在具體的「個人」、「群體」身上，也發生在以丁莊為代表的「鄉村」身上，結果人去村空。更進一步，類似的「疾病」，是否也正發生在「中國」身上，會不會也導致中國的「死亡」？我們藉由中原農民經由賣血而「進入全球化的經濟和病毒交易循環」<sup>⑨</sup>的結局，彷彿窺見束縛、綁架於資本主義全球化經濟戰車上無法獨善其身的中國命運和未來。在此意義上，閻連科有着異常清醒的自覺：「『夢』也和當今瘋狂發展的經濟密不可分，所謂『丁莊夢』也



《丁莊夢》有虛幻的夢境，但更多是血淋淋的現實「再造」。閻連科筆下的艾滋病橫掃平原大地，激發了各種頑疾與貪欲，進而死人無數、毀村滅寨，無人能擋。《丁莊夢》直逼人心，戳破我們殘留的夢想氣球，留下一片廢墟。

是全國經濟發展的梦想。過了10年、50年之後，你可能會覺得今天的社會具有很大的『烏托邦』的意義。每個人每個階層都混沌不醒，被『金錢夢』和『富裕夢』籠罩着。」<sup>④⑤</sup>

《丁莊夢》有虛幻的夢境，但更多是血淋淋的現實「再造」。在法國作家加繆(Albert Camus)《鼠疫》(*La peste*)<sup>④⑥</sup>和中國作家遲子建《白雪烏鴉》等流行性瘟疫題材作品，以及近年來西方的災難大片《後天》(*The Day after Tomorrow*, 2004)、《2012》(2009)，抑或《末日危途》(*The Road*, 2009)中，人往往最終戰勝瘟疫／災難，獲得新生，而一度肆虐的疾病或災難，反起了滌蕩社會和人心的作用。反觀寫作《丁莊夢》的閻連科，卻是如此決絕與無情，他筆下的艾滋病橫掃平原大地，激發了各種頑疾與貪欲，進而死人無數、毀村滅寨，無人能擋。前面提到的作品給人以劫後餘生的希望，而《丁莊夢》卻直逼人心，戳破我們殘留的夢想氣球，留下一片廢墟。

閻連科在《丁莊夢》所述的，是一個國家與鄉村如此形同陌路，精英闕如，信仰破滅，希望渺茫的世界。這個世界裏物欲泛濫，吞噬人心，疾病遠播，沒有諾亞方舟，無從救贖，遠甚於同輩作家王安憶《小鮑莊》之曠世洪災或韓少功《爸爸》裏村寨之間的毀滅性群毆械鬥，同樣擯棄了其早年魔幻意蘊濃厚的作品《年月日》裏，孤守空山的老人「先爺」用生命的代價去艱難呵護和換取的再生希望<sup>④⑦</sup>。在故事行將終結之際，丁水陽老人推開一扇又一扇空門，丁莊人走村空，了無生氣，瀰漫其間的絕望感，讓人窒息。

丁莊的末世夢魘，似幻還真。

### 註釋

① 參見閻連科：《丁莊夢》(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6)。該小說早在2005年由香港文化藝術出版社和新加坡玲子傳媒私人有限公司出版，另有2006年台北麥田出版的版本。

② 中國大陸關於「集體賣血」的代表性出版物，參見高耀潔：《中國艾滋病調查》(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徐曉軍：《斷裂、重構與新生：鄂東艾滋病人的村莊社會關係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

③ 關於這一時期的相關研究，參見閻雲翔著，龔小夏譯：《私人生活的變革：一個中國村莊裏的愛情、家庭與親密關係，1949-1999》(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陳柏峰：《鄉村江湖：兩湖平原「混混」研究》(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1)。

④⑤ 陶然、劉明興、章奇：〈農民負擔、政府管制與財政體制改革〉，《經濟研究》(北京)，2003年第4期，頁4-5；6。

⑥ 高耀潔在《中國艾滋病調查》一書裏寫到：「災難起源於因貧窮導致的賣血，有賣血就有輸血，於是引發了艾滋病在農村的大面積流行。」參見高耀潔：《中國艾滋病調查》，頁6。

⑦ 閻連科、張學昕：〈寫作，是對土地與民間的信仰〉，《西部》，2007年第4期，頁142。

⑧ 參見閻連科：《日光流年》(廣州：花城出版社，1998)；《堅硬如水》(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1)；《受活》(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2004)。

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 閻連科：《丁莊夢》，頁21；21；22；23；25；27、28、29；30；31；33；29；16。

- ⑩ 梁生寶、蕭長春分別為1950至1960年代中國大陸著名的農業集體化題材小說《創業史》和《豔陽天》中所極力塑造並且家喻戶曉的鄉村基層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帶頭人形象。參見柳青：《創業史（第一部）》（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60）；浩然：《豔陽天》，三卷本（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5）。
- ⑪⑫ 譚同學：《橋村有道：轉型鄉村的道德權力與社會結構》（北京：三聯書店，2010），頁407；406。
- ⑬ 李三仁明顯有別於文學作品中常見的、有着超常權威的「大家長」或者「族長」式的人物，如巴金小說《家》裏的高老太爺，曹禺話劇《雷雨》中的周樸園，陳忠實小說《白鹿原》裏的白嘉軒，李佩甫小說《羊的門》中的呼天成，或者張煒《古船》裏老謀深算的「四爺爺」趙丙等。
- ⑭ 鄭煬和：〈論鄉村精英與鄉風文明建設——從權威與秩序的視角〉，《寧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09年第3期，頁113。
- ⑮ 如吳毅認為告別「革命」後的村莊，已呈現出「去政治化」的特徵，參見吳毅：《村治變遷中的權威與秩序：20世紀川東雙村的表達》（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頁334。閻雲翔則從「私人生活」對「集體生活」的取代來印證國家對農民和農村影響力的式微，參見閻雲翔：《私人生活的變革》，頁260。
- ⑯ 周立波：《暴風驟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
- ⑰ 參見唐小兵：〈暴力的辯證法：重讀《暴風驟雨》〉，載《英雄與凡人的時代：解讀20世紀》（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頁128。
- ⑱ 范穩：《水乳大地》（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阿來：《空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遲子建：《白雪烏鴉》（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
- ⑲ 高耀潔指出：「中國艾滋病主要的傳播途徑與外國不同，它來源於20世紀90年代的『血漿經濟』，受害者呈現局灶性發病而死亡，令人觸目驚心。……中國艾滋病主要是『血禍』造成的，且不是河南省的『專利』，是全國性的。」參見高耀潔：〈序〉，載高燕寧主編：《艾滋病的「社會免疫」》（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頁6。
- ⑳ 閻連科在小說正文裏，除了寫高局長外，並沒有塑造其他類似的官員；除了集中寫丁莊，以及比丁莊更早的賣血「樣板村」上楊莊之外，並沒有用太多筆墨去渲染在當時當地相當普遍的賣血鼓吹。
- ㉑㉒ 閻雲翔：《私人生活的變革》，頁258；260。
- ㉓ 曹錦清：《黃河邊的中國——一個學者對鄉村社會的觀察與思考》（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頁34。
- ㉔ 賀雪峰、曹暉：〈防止消費主義文化對農民的剝奪——華中科技大學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賀雪峰訪談錄〉，《中國老區建設》，2009年第4期，頁26。
- ㉕㉖㉗㉘ 王德威：〈革命時代的愛與死——論閻連科的小說〉，《當代作家評論》，2007年第5期，頁35-36；35；37；36；35。
- ㉙ 黃金麟：《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1895-1937）》（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頁9。
- ㉚㉛ 劉偉：〈閻連科的鄉土批判——對《受活》與《丁莊夢》的比較閱讀〉，《社會學家茶座》，2008年第1期，頁96。
- ㉜ 閻連科：〈有三種人不適合看《丁莊夢》〉，《北京娛樂信報》，2006年1月24日。
- ㉝ 夏榆：〈閻連科：生活的下邊還有看不見的生活〉，《南方周末》，2011年5月25日。
- ㉞ 閻連科、關軍：〈精神上的艾滋病更可怕〉，《大連日報》，2006年1月24日。
- ㉟ 加繆（Albert Camus）著，郭宏安、顧方濟、徐志仁譯：《局外人；鼠疫》（南京：譯林出版社，2007）。
- ㊱ 王安憶：《小鮑莊》（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6）；韓少功：《爸爸爸》（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閻連科：《年月日》（鄭州：河南文藝出版社，2010）。